

基督教在蒙古的傳播

編輯室



蒙古的國會大廈

一隊隊駱駝商隊走在無垠的戈壁沙漠上，艷陽高掛，這是我們印象中的蒙古，其實這只是夏季的景色；到了冬季，厚雪蓋地，方圓千里白茫茫，杳無人跡。然而，每年7、8月水草豐茂、牲畜肥壯的夏秋之交，雲淡風高，草原上佈滿了白色的蒙古包和各式帳篷，人群簇擁，摔跤、賽馬、射箭等，是蒙古人大顯身手的時刻，豪邁、爽朗的性格盡顯無遺。

但令人惋惜的是，外蒙(蒙古國)至今信主的比例只有0.7%。按專門研究群體的約書亞計劃所劃分，蒙古國內的群體共20個，未得之民群體有17個。翻看歷史，基督教早在十二、三世紀時已經傳到蒙古人中間，而且有幾個部族全族歸主。基督教傳入到蒙古人中間，可以分為幾個截然不同的階段：

一、景教時期

一提到蒙古，除了想起浩瀚的沙漠外，很多人會想起成吉思汗(本名為鐵木真)，他所屬的部族是克烈部的一個小支部乞顏部，而克烈部、乃蠻部和摩傑部，在十二、三世紀時算是全族歸主。這些部族在貝加爾湖東狩獵和逐水草而居，遇上了波斯教會的聶斯多留派信徒而歸主。蒙古人一向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，所以一人歸主

很可能帶領全族歸主。聶斯多留派就是在唐朝所建的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」中所稱的景教，因為對基督神性和人性的爭論而被指為異端，但在波斯教會受到擁戴。(註)

聶斯多留派是一個積極宣教的團體，在亞洲中部的土地上領了很多民族歸主。其中一個例子是在中國西邊的畏吾兒族，在中國唐朝時歸信了景教，但其後他們的勢力衰弱，被迫往西面遷移，受到伊蘭教的勢力所影響，最終以伊斯蘭教為其文化主導，至為可惜。而聶斯多留派為他們寫的經卷後來落在蒙古人手中。

乞顏部的鐵木真憑著天生的剛毅性格，東征西討，統一了蒙古草原的眾部族，在公元1208年建立了蒙古帝國，被尊為成吉思汗；「成吉思」是「海洋」、「強大」的意思。成吉思汗有四個出色的兒子：朮赤、察合台、窩闊台和拖雷。按蒙古傳統習俗，是由幼子守護故土的，但成吉思汗逝世後，拖雷放棄承繼權，由窩闊台繼位，日後也有多次嚴重的繼位糾紛以致分裂。成吉思汗也像其他部族的領袖一樣，以通婚來擴張勢力。他娶了克烈部領袖王罕的大姪女為妻，也將她的妹妹娶為四媳婦(拖雷之妻)。因為這個習俗，成吉思汗的家族中有不少成員是景教徒，也將信仰傳予後代。當時信徒之多，需要成立有系統的組

織以管轄和栽培，並且設立了主教長。

二、羅馬教廷的傳教團隊

蒙古帝國建立後，帶來了一段和平的時期，不單促進了亞、歐兩洲的商業、文化交流，也為當時教廷的外展工作打開了大門。從1245年至1342年的100年間，有7至8個宣教團隊長途跋涉來到亞洲，多屬方濟會，也有道明會的修士。首批的宣教團隊是帶著政治和宗教的雙重目的而來；在政治上，為防止蒙古人進一步攻擊基督教世界；在宗教上，當然是為傳播基督教，領人歸主。

教宗依諾森四世(Innocent, 1243-1254)於1245年差派方濟會的柏朗嘉賓(John of Plano Carpini)到蒙古人中間，是首位到蒙古的宣教士。當他與同伴二人經過了9個月騎馬的顛簸行程，抵達西亞洲，將教宗的文件送到欽察汗國的統帥拔都手上，拔都卻拒收，請他送交中土的蒙古貴由汗(窩闊台的長子)。柏朗迫得再走5個月的艱苦行程，才抵達蒙古的宮廷。因此他驚訝地發現，宮廷內有眾多的景教徒(蒙古語稱之為「也里可溫教」)，可惜貴由的回應並未如教廷所期望。

七年之後，第二位使者羅伯魯(William of Rubruck)抵達了蒙古的京城，得到蒙哥汗的接待。他發現朝中確有不少景教信徒，但途中看見不少異教的廟宇(相信是佛教寺廟)，也有清真寺，覺得不如柏朗所描述，令他驚訝不已。這時已是十字軍東征的後期，伊斯蘭教的勢力漸漸復原。

三、蒙古人入主中原

1278年，成吉思汗的孫兒、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南下滅了宋朝，建立元朝，稱元世祖，景教也隨之重回中原。他在位期間，大批中亞、東歐的景教徒也來到中國。元世祖至元十二年(1275年)，景教在京城大都(今北京)設置主教座，除大都外，福建泉州也成為南方的景教中心，揚州、杭州、昆明以及甘肅等地，先後建造了景教寺，據稱信徒超過3萬人。

羅馬教廷方面，也屢次派遣使節前來。至元三十一年(1294年)方濟會修士約翰孟高維諾(John Monte Corvino)以羅馬教廷使節身份到中國，獲

准在京城興建教堂，信徒多為蒙古人、阿蘭人和色目人，皇慶二年(1313年)也在福建泉州設立教區，信徒約有6萬。他們稱當時的天主教為「也里可溫教」。

因為陸路交通的開拓，東西貿易也隨之發展，著名的商人馬可孛羅(Marco Polo)父子也在這期間前來經商。馬可孛羅所寫的《東方遊記》中記載，他在中國見到許多基督徒。

元世祖忽必烈對世界上的各種宗教充滿好奇，也曾要求教廷差派100位教士來華，向官員講解基督教教義；但他也邀請佛教僧侶前來。可惜，因為戰爭的阻隔，10年後羅馬教廷才差來了10名修士，但他們不能讀、也不能寫蒙古語，能傳講的信息相當有限；反之，一批佛教僧侶較早前已從西藏來到，忽必烈接受了藏傳佛教。

我們不能確定忽必烈邀請100位教士來中國的動機，但可以肯定的，羅馬教廷失去了一次讓蒙古人歸主的機會。元朝覆滅後，也里可溫教在中國幾乎消失了，在以後的700年裡，蒙古的大門一直沒有再開過。至今，蒙古人的宗教仍以佛教為主，很多屬藏傳佛教，也有不少回到原始的薩滿教。

四、更正宗基督教會的宣教

1. 十九世紀

元朝滅亡後，蒙古人迫得返回大漠，至十九世紀初，無論內蒙或外蒙，很可能都沒有本土教會。但神一直眷顧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1815年，英國聖書公會(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)出版了一本由史密特(I. J. Schmidt)教授翻譯的卡爾梅克語(Kalmuck)馬太福音，卡爾梅克語是居於西伯利亞和蒙古北部邊緣的蒙古人所用的語言。這個經卷輾轉的傳到了布里亞特(Buryat)人喇嘛手中，他們對當中所蘊含的信息甚感興趣，其中有喇嘛高僧籌措了一些資金，希望將這卷福音書和其他的新約經卷翻譯成蒙古布里亞特語。俄羅斯聖經公會接辦了這項工作，並且有兩個布里亞特人領袖到了聖彼得堡(St. Petersburg)協助史密特。

俄羅斯聖經公會因此聯絡倫敦傳道會(London Mission Society)。1817年，瑞典的拉姆

(Kornelius Rahmn)和倫敦的施德華夫婦(Edward Stallybrass)在西伯利亞和蒙古邊界附近設立了宣教站。稍後，史維廉(William Swan)又抵達。施德華與史維廉學習蒙古語(蒙古部族方言雖多，但能彼此溝通)，翻譯蒙古語聖經，1840年出版了舊約。可惜，1841被俄羅斯禁止，兩人被迫回國，但仍繼續譯經工作，1846年出版新約。這是十九世紀早期的宣教工作。

1870年，倫敦會差派年青的基目爾(James Gilmour)來中國，但基目爾預感會到蒙古人中間去，而且他有一本蒙古語聖經，結果他如願以償。為了蒙古部族，他經常撇下妻子，隨著沙漠商隊到在各地遊牧的蒙古人中間，向他們宣講福音真理。可惜，歸信的蒙古人寥寥可數，因為異教的影響，尤其是藏佛教相當深入，成為一堵堅固的牆壁，蒙古人無法聽到基督的福音。21年後，他染上了斑疹傷寒，英年早逝，於1891年去世，年僅48歲。

然而，宣教士前仆後繼進入內、外蒙古，有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宣教隊伍，也有屬瑞蒙會(Swedish Mongol Mission)、世界宣教會(TEAM)等；可惜果效並不大，教會弱小，宣教士也有因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而殉道。

2. 蒙古國建立後

神的時間到了，蒙古終於開放了，今日外蒙古的教會已開花結果了。1921年外蒙古成為無神論的共產國家，境內所有宗教都被清除了；但1991年蒙古脫離俄羅斯獨立，成為民主國家，稱為蒙古國，憲法上有了宗教自由。雖然蒙古人



的心仍然剛硬，要剷除的阻力仍有不少，但更正宗基督教的宣教士早已於1990年已經進入了蒙古國。這二十年來，信徒一直在增長，也有新教會建立。據統計，單在首都烏蘭巴托一地已有200個教會，而福音也已進入其它大城市，甚至到了放牧的地區，粗略的估計這些地區也有約200個教會。1998年，蒙古全境約有1萬名信徒，10年後倍增，粗略估計約5萬至6萬，而且還在持續增長，是今日教會增長最迅速的地方。蒙古教會更有一個「20/10異象」，目標是在2020年基督徒人數增長至人口的10%。

蒙古聖經公會也於1990年成立，開始翻譯新約蒙古語聖經，福音也得以傳開。但由於對「神」一詞的用字問題，須進行修訂，採用現代蒙語，使更容易閱讀，全本聖經預計於2010年初出版。(參www.goforchrist.org網頁)

現時在蒙古的14個福音派差會也組成基督教服務機構(Joint Christian Services, JCS)，透過多元化的社會服務，如戒酒事工、為牧民開辦幼稚園、發展農業及畜牧業等工作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，也讓蒙古人認識基督信仰。也有多個學生事工團體如學園傳道會、學生福音團契、UBF等努力透過營會、講座、學生門訓小組向專上學生傳福音。同時為實踐本土化，開辦神學院、聖經學院(有蒙古聯合聖經學院，簡稱UBTC)以培訓本地牧者，也開辦延伸神學教育來裝備信徒領袖。

3. 華人教會

烏蘭巴托一地約有3至4千多的華人(流動性很大，在長長的寒冬，華人會到較南的中國城市避寒)，有一個華人教會，是由國外的華人宣教士資助和帶領的，人數也在增長，由兩年前20多人聚會增至目前的40多人，去年聖誕節時有5人受洗加入教會。而到當地經商或工作的流動華人有十餘萬之多(大多來自中國)，也是向他們傳福音的機會。另一方面，當地的華人已到了第四代，蒙古語已成為他們的母語，成為向蒙古人傳福音的渠道。去年底，教會藉舉行聖誕節濟貧福音聚會接觸蒙古人，不但提供他們生活所需食糧，也給予生命之糧。感謝主，前來的蒙古人中有25人決志

成吉思汗銅像



民主之父



摔跤館



蒙古國立大學

信主，有7人願意參加教會聚會，教會現已決定開始蒙古語小組。

五、面對的挑戰

蒙古的教會雖在增長，但也遇到很嚴重的挑戰。現代化、自由思想帶來的不單是貧富懸殊、物質主義，也使各種神靈崇拜復興，藏傳佛教捲土重來。同時，蒙古兩大政黨前共產主義政黨蒙古人民革命黨(Mongolian People's Revolutionary Party, MPRP)及蒙古民主黨(Democratic Union Coalition, DUC)的競爭，對民生和經濟帶來不利的影響，政府政策也對基督教的發展產生阻力，對宣教士的居留也設立了不少關卡，簽證不易。此外，由於地方廣大，牧養和跟進教導不易，掛名信徒是一個嚴重的問題。

然而，蒙古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，需要各方面的人材，這正是帶職事奉的良機，盼望華人信徒願意踏足這一片大漠，在那裡開關活水的江河。

註：

公元330年，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將首都由羅馬遷移至東方的新羅馬，並改名為君士坦丁堡，這意味著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與羅馬教區的主教在宗教上具同等地位，自此引起埃及亞歷山大教區的不安。428年，屬於安提阿學派的聶斯多留(Nestorius)被委任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長，他用了「神的母親」來稱呼馬利亞，亞歷山大主教長歐利羅(Cyril)認為他貶低了基督的神性，並提高了馬

利亞的地位，使東、西方教會對基督論的爭議達到白熱化。431年的以弗所會議中，把聶斯多留定為異端，被放逐，他輾轉到了埃及並死在那裡。在後來發現的聶斯多留著作中，他一直以自己為正統，今日很多學者都認為整個事件牽涉了複雜的政治因素，一直未有定案。

在五世紀末，兩派的分歧愈深，基督論的爭議也傳至亞洲。聶斯多留的主張得到波斯教會的擁護，產生了所謂聶斯多留派(Nestorianism)，他們向東宣教，不單令阿拉伯人相信基督教，也在印度創立了基督教的等級制，更把福音帶到東亞洲。中國唐朝太宗貞觀九年(635年)，阿羅本來到中土，宣傳教義，是為「景教」。

參考書籍

莫菲特著，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譯《亞洲基督教史》第十八、十九章（香港：文藝，2000）

Gunzel, Syuart and Hoke, Donald E. "The Mongolian People's Republic," Hoke, Donald E. ed., *The Church in Asia*, (Chicago: Moody Bible Institute, 1975)

馮承鈞譯《蒙古與教廷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94）

陳惠文主編《普世宣教手冊》（美國：大使命中心，2003）

楊牧谷主編《當代神學辭典》（台北：校園，1997）

范張秀明編《宣教日引》2010年春，（美國：萬民福音使團出版，2010）

蔡錦圖〈在大漠中流出的江河——蒙古文聖經〉《時代論壇週報》第1169期，2010年1月24日

海外基督使團《東亞呼聲》通訊